

華東地區省市所屬師範院校協編教材

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朱德發 蔣心煥 陳振國 主編

明天出版社

xinbian
zhongguoxiandai
wenxueshi

华东地区省(市)属师范大学协编教材

国学系 教科书 史教材 编主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朱德发 蒋心焕 陈振国 主编

赵景林 华桂林 李惠鼎

孙 峰 华国强 高先阳

王士林 高 勇 钟新贵

封培黎 徐昭南 夏山林

明天出版社

1989年·济南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朱德发 蒋心焕 陈振国

主 编

明天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明天出版社总发行 山东临沐印刷厂印刷



880×1108毫米 32开本 24.375印张 544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32—0581—2

I·85 定价：7.95元

主编 朱德发 蒋心焕 陈振国

编写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嘉良 史承钧 刘 泓

吕家乡 朱德发 汪大钧

邹水旺 汪亚明 陈振国

张惠达 杭振华 林碧珍

胡尹强 查国华 姚 健

黄海祥 黄 齐 韩之友

蒋心焕 谢昭新 蔡传桂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编 新文学理论思潮	(42)
第一章 文学观念的演变.....	(42)
第二章 文学批评的发展.....	(86)
第二编 中国现代文学巨匠	(109)
第一章 鲁 迅.....	(109)
第二章 郭沫若.....	(145)
第三章 茅 盾.....	(167)
第三编 诗歌.....	(192)
第一章 “诗体解放”及新诗发展轨迹.....	(192)
第二章 胡适和早期白话诗.....	(202)
第三章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	(210)
第四章 闻一多、徐志摩和新月诗派.....	(222)
第五章 象征派与现代派的诗.....	(236)
第六章 蒋光慈、殷夫的政治抒情诗.....	(248)
第七章 蒲风、臧克家、田间的诗.....	(256)
第八章 艾青的自由体诗.....	(264)
第九章 七月诗派.....	(272)
第十章 李季、阮章竞与叙事诗.....	(281)
第十一章 马凡陀等的政治讽刺诗.....	(292)

第四编 小说(上).....	(298)
第一章 小说革新及小说发展轨迹.....	(298)
第二章 冰心与“问题小说”.....	(309)
第三章 叶绍钧与人生小说.....	(321)
第四章 郁达夫与自叙传小说.....	(331)
第五章 曾彦与乡土小说.....	(343)
第六章 丁玲与女性小说.....	(356)
第七章 新感觉派小说.....	(368)
第八章 叶紫、王统照与三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	(378)
第九章 萧红、萧军与东北作家群的小说.....	(390)
第十章 许地山、艾芜的域外题材小说.....	(402)
第十一章 张天翼与沙汀的讽刺小说.....	(416)
第五编 小说(下).....	(429)
第一章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429)
第二章 老舍的市民小说.....	(443)
第三章 蒋光慈与普罗小说.....	(456)
第四章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	(467)
第五章 赵树理的农民小说.....	(479)
第六章 孙犁的抒情小说.....	(491)
第七章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与《暴风骤雨》	(500)
第八章 《新儿女英雄传》等解放区小说.....	(512)
第九章 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	(523)
第十章 路翎及七月派小说.....	(535)
第十一章 《围城》与《传奇》.....	(545)
第十二章 《虾球传》等国统区小说.....	(556)
第六编 戏剧.....	(567)



第一章	戏剧革新及戏剧文学发展轨迹	(567)
第二章	五四时期的“问题剧”	(579)
第三章	田汉的浪漫主义剧作	(588)
第四章	洪深的《农村三部曲》	(597)
第五章	话剧文学高峰——曹禺的剧作	(603)
第六章	夏衍的剧作	(615)
第七章	抗战时期的历史剧	(626)
第八章	于伶、宋之的等的暴露剧	(635)
第九章	陈白尘、丁西林的讽刺喜剧	(646)
第十章	解放区的新歌剧	(657)
第七编	散文	(665)
第一章	现代散文的崛起及其发展轨迹	(665)
第二章	瞿秋白的散文	(677)
第三章	周作人的“美文”	(686)
第四章	朱自清与冰心的小品文	(692)
第五章	郁达夫与徐志摩的游记散文	(701)
第六章	徐懋庸与唐弢的杂文	(707)
第七章	巴人与聂绀弩的杂文	(712)
第八章	丰子恺与吴伯箫的散文	(718)
第九章	丘东平与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	(724)
第十章	刘白羽与周而复的报告文学	(730)
结语		(738)
后记		(770)

绪 论

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一种新质的文学，但它的新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这当中有着时代的催生，也含有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在其演变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中国近代文学成了它的先导。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驱者经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沉痛反思后而取得转换的。

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它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同社会文化意识结构的变动同步的。中国近代文学向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文学转换是与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政治意识的觉醒到伦理意识的觉醒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陈独秀曾把近代中国的意识觉醒概括为三个逻辑阶段，即科技的觉醒、政治的觉醒和伦理的觉醒。当欧洲上空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处在封建主义的昏睡状态之中。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造成了对世界的极端无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出现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改革派人士，他们面对满目疮痍、内外交困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更法改革的呼声，但他们所提出的兴利除弊主

张仍局限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内。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被镇压，近代中国愈发落在世界后面，濒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之士，从现实的教训中认识到西方“战舰之精”，“机器之利”，主张“师其所长而用之”，积极从外国引进新式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于是洋务运动兴起，此所谓科技的觉醒。与洋务运动发起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兴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客观上至少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中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寻求新的救国方案，变法维新运动便顺乎自然地迅速发展起来。变法维新和救亡图存就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的客观意义是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有觉悟的民主革命的阶段，它标志着“中国的旧式骚动”终于“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①。

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救亡这个历史主题始终贯穿；近代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群，始终把政治斗争作为关注的焦点，整个社会的政治意识的觉醒也逐渐高扬。政治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是有了一支新式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通过古老的封建传统和西方的先进思潮的强烈对比，又经过戊戌变法失败的分化，队伍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大多是年青的一代，是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新完全的社会阶层，也就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

①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8页

的：“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同，这批知识分子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逐渐觉醒起来的思想特征。他们发挥自己的所长，大量的革命报刊书刊开始由他们编印和传播，其中心论题，大多都是爱国、救国和革命。这一代知识分子，尽管还不能从本质上深刻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征，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外拒白种，内复满洲”的历史任务。十九岁的邹容在所著的《革命军》一书中，着重宣传了为民主自由而革命的思想。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中着重宣传了为爱国、救国而革命的思想。他们的著作中洋溢着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表现出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融为一体文学态度，反映了强烈的政治民主意识。即使表现生与死这样永恒的题材时，也渗透了高度的政治意识。高旭在他的《戊戌杂诗》中写道：“阅尽沧桑未足哀，即生即灭去还来。最无用是皮囊臭，付与豺狼碎作灰。”爱情文学这个本是最属于抒写个人复杂情感的精神世界，也涂染着异常明亮的政治色彩。“娶妻当娶苏菲亚，嫁夫当嫁马志尼”^①。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把他们的革命理想、政治使命感，通过种种舆论武器进行明确表述，而且直接投入一系列的急进的爱国革命活动。

^①高旭：《报载某志士送其未婚妻北行赠之以诗阙焉为补六章·之三》，转引自刘纳《论“五四”新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总之，以民族革命为主要特点的政治意识日益觉醒，并贯穿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①面临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们差不多都把视点移向西方，在五四前后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所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中，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强烈地摇撼了中国古老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意识形态，并源源不断涌向中国。在这种形势下，被进步舆论界誉为“思想界的明星”的陈独秀进入了更深层的探索。他明确地指出：“政治界虽然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②他总结了历史的教训，从对比中提出使中国摆脱贫困、挨打，走向独立、富强的方案：“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③“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

①吴玉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1年版。

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③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5号。

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家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①陈独秀在这里尖锐地批判了“贤人政治”“立宪政治”之弊端，并指出造成这弊端的根子，乃是“没有发动一个‘多数国民之运动’”。国家富强之道，重要的乃在启发“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建立起一种新的民主政治来唤起国民真正的觉悟。陈独秀采用中西文化相对比的方式，提出了使国民走向“觉悟”之路：“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②陈独秀从当时思想界的实际出发，选择了改变中国面貌，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进行一次深刻而彻底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何以把伦理革命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呢？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化了的文化；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核心。就家庭来说，父子、夫妻和长幼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就国家来说，则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关系。忠、孝、贞操三者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内涵。封建统治者就是以这三者作为他们愚弄人民，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所以五四时期，伦理革命的呼声最高。打倒孔家店，反

^{①②}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6号。

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启迪群众伦理意识的觉醒，成为新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忠、孝、贞操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释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①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铲孔教灭伦常，并以此为核心推动整个文化的改革，成为《新青年》、《新潮》等报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陈独秀等人以比梁启超、谭嗣同更加勇猛决绝的精神，公开声明“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并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儒学同现代社会、家庭和学术之格格不入。

中国伦理文化是以立家为立国之本。与此针锋相对，伟大的启蒙家鲁迅早在晚清民族意识很浓的时候，就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要求“非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②，意在强调个人的发展，个性的解放。到了五四时期，他大声疾呼“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③。著名的诗

①陈独秀：《调和论之旧道德》，《独秀文存》（4）第71页。

②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人郭沫若也发出了类似的宣言：“我过去的生活只是在黑暗地
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①郁达夫
说得更好：“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
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
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②这些呼喊和论断很有代
表性，标志着一代新知识分子伦理意识的觉醒。“五四”一个重
要历史功绩，是把人放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把人的意识的
觉醒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没有人的觉醒，就没有民族的觉
醒，“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
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
的道路。”③

“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藉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
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④
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特别是从
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竭力宣传西方国家学
说、民族学说，从而形成了我国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
他们所关注的是政治运动，甚至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
命）放在政治斗争方面。尽管梁启超、邹容等人提出了可贵的
思想启蒙主张，但由于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热点是政治，因而很

①见《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41年5月版。

②《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1945年7月
版。

③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1)，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快的为高涨的时代洪流所冲击。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特别是民初外患内乱的黑暗现实，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先驱者，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实现了古老文明的新生。他们兴奋的热点，不再主要集中于社会斗争，而是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了，他们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启迪国民的自觉上，放在争取人性的彻底解放上。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从政治意识觉醒到伦理意识觉醒的转换正体现了这种时代特色，并揭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意识随乎潮流的变化和发展。

从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文学革命

随着中国人民从政治意识到伦理意识的觉醒，中国文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从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文学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在外来思潮的刺激下，近代中国知识者，虽然萌发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并在文学主张和创作上有所表现，但这种表现是十分微弱的。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所激起的爱国激情，特别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的勃兴，中国传统知识层开始向近代思想、理论转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掀起了一场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学从观念到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或思维方式、艺术手段，都带有近代文化特征，文学所显示的国家意识和政治功利色彩尤为强烈。

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适应“维新”和造就一代“新民”的需要，发动了“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

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指出：“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耶，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他所说的“新意境”，是以“欧洲之精神思想”为“诗料”的。他称赞黄遵宪的《军歌》，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诗界革命反对传统的儒家泥古不化的诗教诗风，要求新诗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意境”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符合诗歌艺术特点的。这些与传统相对立的新特质，无疑对五四新诗运动，在观念和方法上，都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与“诗界革命”同时，梁启超又提出“文界革命”。梁启超强调文界革命的目的在“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就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开启民智。他在报章上发表的大量散文实践了自己提出的主张，被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后来，梁启超对新文体的特点作了概括：“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②新文体的实施，不只同占统治地位的文言文相对立，而且它找到了向白话文过渡的途径，其意义不仅限于形式、文体。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中国第一种文学报刊《新

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小说》，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梁氏小说界革命的核心，乃是视小说为政治工具，小说具有万能的社会之力。1897年，他论及日本变法时曾指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①1902年，他更为明确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哉。”②梁启超一反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③“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一出现，就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乎汗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上述种种“革命”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学开始发生裂变；更为重要的是含有新质的近代文学，从观念、内容到表现形式均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在小说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小说不入史。“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④，“向来是看作邪宗的”⑤，这种成见，从汉一直延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

①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告合序》。

②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④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